



加尔布雷思传

他的人生，他的政治学，他的经济学

理查德·帕克◎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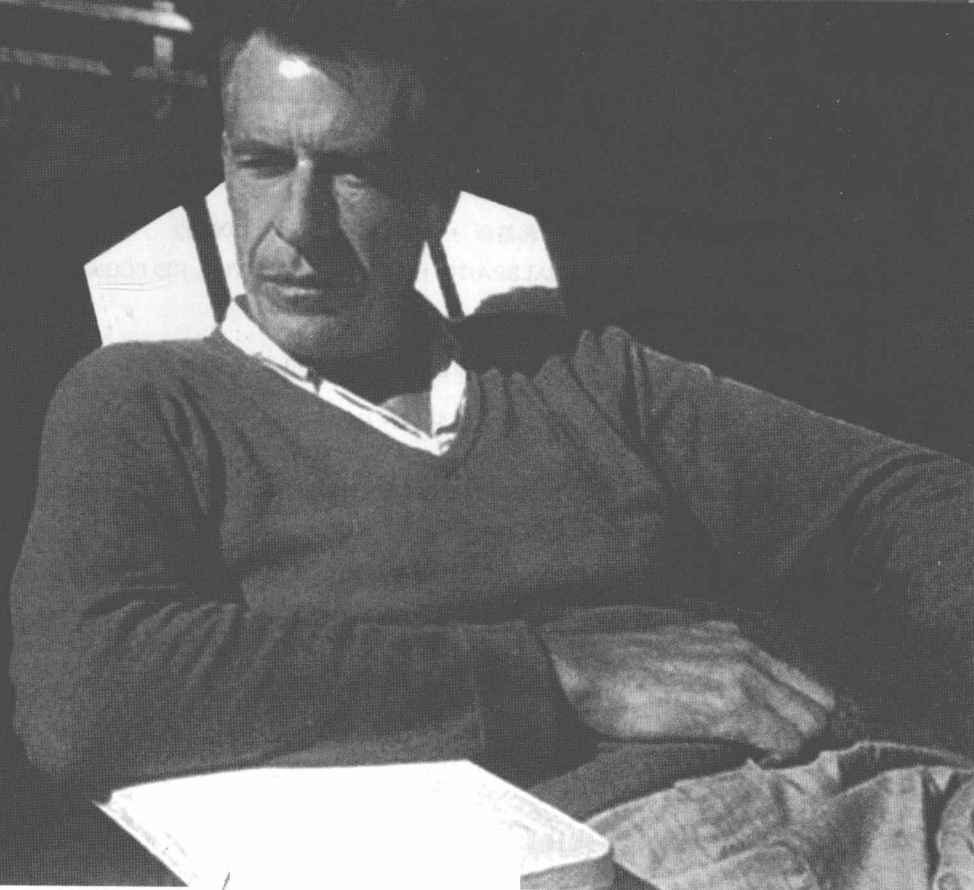
郭路◎译

JOHN
KENNETH
GALBRAITH

His Life, His Politics, His Economics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加尔布雷斯传

他的人生，他的政治学，他的经济学

理查德·帕克◎著

郭路◎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加尔布雷斯传 / (美) 帕克著, 郭路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9.12

书名原文: JOHN KENNETH GALBRAITH: HIS LIFE, HIS POLITICS, HIS ECONOMICS

ISBN 978-7-5086-1593-6

I. 加… II. ① 帕… ② 郭… III. 加尔布雷斯, J.K. —传记 IV. K837.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6937 号

JOHN KENNETH GALBRAITH: HIS LIFE, HIS POLITICS, HIS ECONOMICS by RICHARD PARKER

Copyright © 2005 by RICHARD PARKE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LLC, New York.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10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加尔布雷斯传

JIA'ERBULEISI ZHUAN

著 者: [美] 理查德·帕克

译 者: 郭 路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插 页: 16

印 张: 32

字 数: 6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7-2993

书 号: ISBN 978-7-5086-1593-6/F · 1680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http: //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 010-84264033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引言



初抵坎布里奇

在9月初的一个清晨，刚过5点，夏日就已冉冉升起。上午7点，和煦的天空昭示着新英格兰美好的一天。在科德角湾，“阿卡迪亚号”这条行驶在旧商人与矿工航线上的轮船，正劈开平静的海水，开始它两日内往返巴尔的摩到波士顿的常规航程。它停靠码头不足三个小时，在上层甲板的栏杆上，一位瘦高个的年轻乘客正向西凝望，仔细端详着左舷下马萨诸塞州港口海岸线一边。

曙光初现，当船正通过科德角运河时，他就起床了。此刻，他正看着灰色岩岸滑过，海滩上有绿松和橡树，林地的边线时不时被星星落落的房屋，还有那些拥挤的小村小镇所切断。一个船员暂时停顿下来，指着普利茅斯的方向，300年前移居美国的英国清教徒们就是在那里登陆的。他有礼貌地感谢了那个船员，然后继续观景。在宁静的海湾，渔船正从小港湾出发，顺着航路开始当天的捕捞。他注意到有几位乘客也起来了，正漫步在甲板上，准备开始各自新的一天。

几位经过他身边的同船乘客打量着他，正如自航行以来，他们不觉中所留意到的那样：这个年轻人身高6英尺8英寸，在他们中间显得鹤立鸡群。在前一天的晚宴上，他曾愉快地与同餐桌的乘客们聊天开玩笑，回答他们提出的种种问题，并谈到过自己。

他们已经知道，这个年轻人是一位经济学人，6月刚毕业，新近获得加州大学博士学位。虽然他刚刚25岁，却已在华盛顿为罗斯福总统的系列新机构，也就是所谓的“农业调整署”（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dministration，简称AAA）工作。他的听众们全是些东海岸都市人，此前还完全不明白这个创立才一年的“AAA”究竟是什么，但现在他们清楚了。1934年，美国正深深陷入“大萧条”，三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仍旧在从事农业，而农民急需帮助，因此会被新政优先照顾。

这个年轻人向他们解释了有关那些已被离弃的、违反税法的农田问题，他向他们保证说，这涉及全国百万英亩的农田，因此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当他说道，有可能会由联邦政府接管这些农田时，同桌进餐的共和党人中有一对夫妇退席了。随后，同桌的人似乎释然了，因为他接着说，自己乘船是前往波士顿，要在哈佛大学任教。他们一定是这样感觉的，有哈佛在，一定会保护这位青年免于投身危险而激进的潮流当中，而这股潮流此时正涌向华盛顿。

除此之外，这名年轻人的其他某些方面，显然还是触动了他们。他很自信，才智过人，在晚餐的过程中，能从多个角度轻松地讨论整个国家的巨大经济危机。他的黄褐色夏季西装，向后梳得油光水滑的栗色头发，角质框架的眼镜和光鉴照人的褐色皮鞋，无不显示着当代学院风格的吸引力。这名年轻人，散发着俊朗的魅力，有一种能够深深打动别人的特质，以及顽强的生命力和勃勃雄心，这一切都使他看来就是那种哈佛所值得拥有的人。麻烦的地方在于他是为罗斯福工作，还有他对新总统及其政策的明显的欣赏态度，不过假以时日，哈佛无疑会磨砺他，让他安定下来，为他指出正确的方向。当他们喝完咖啡、彼此告别时，几位同餐桌的人，已暗自推测这位小伙子将会去个“好地方”，他是那种走好运的人，会在岁月里留下印记。

在现代美国人的生活中，名人的头衔几乎是由媒体随意赐予的，短命得转瞬即逝，特别是在如吞噬一切的独眼巨人般的电视镜头下，那些情景喜剧明星、流行歌星、运动员、意外伤亡受害者、彩票赢家、成功（或者丢人现眼）的政客都成了名人，他们全都无止境地欢跳着列队前行，到下周或明年，就会被天晓得的新面孔取而代之，然后被遗忘。

真正的名声是不同的东西。古希腊人所理解的名声，反映着性格，而与所谓的名人无关。对他们来说，性格犹如先天才干与美德所交织的挂毯，印刻着人生的经验和无常命运。名声不像名人那样被滥用，它只是极少数人才有的特征，因而延续得更长。

在那次航行过去 70 年后的今天，从第一次赢得广泛赞誉的作品起半个多世纪后，哈佛大学教授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昵称肯）仍旧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是 42 本书的作者，写了 1 500 多篇文章，拥有近 50 个荣誉学位，他还是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前主席及总统顾问和前大使。在行将 90 岁高龄时，他仍继续写作、旅行和讲学。正如当初的那个晚上，搭乘“阿卡迪亚号”的同餐乘客所认为的那样，加尔布雷斯以无数的方

式在岁月中留下了他的印记。

1934年夏末，“阿卡迪亚号”停靠在波士顿联邦码头。走下踏板的肯·加尔布雷斯（他一向乐意被人这样称呼），还只是一个年轻无名的大学讲师，正如多年来涌入坎布里奇的其他数以百计的年轻男子一样，他的前途一片光明，但还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就。70年后的今天，加尔布雷斯的成熟性格已不言自明，当我们反观当年的情景，就可以发现对其品格起决定作用的三种影响，这些影响不仅标志了他日后在哈佛的学术生涯，还标志了他与更广大经济学界的关系以及他最终的名望。

第一个影响可以从他初抵坎布里奇的方式看出。与大多数秋季班开课的师生不同，加尔布雷斯选择搭乘“阿卡迪亚号”出发。选择乘船并非偶然。选择从华盛顿发车的巴尔的摩至俄亥俄州快速铁路上的夜间列车，会更快、更便宜，因而更有效率。效率，这对现在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可是个近乎神圣的信条，但对这位年轻的经济学家而言，效率只是众多值得考虑的标准之一，他的本意是想把自己第一次抵达坎布里奇的经历作为一个纪念，并以某种特殊的方式表现出来。他还从未见过大西洋，选择乘船旅行是一种方便适宜的方式。这一次惬意的航行，他只需支付18美元（包括餐费及铺位）就能有足够的时间，在无尽的海上纵情沉思。所以一点也不奇怪，在他的脑海中会充斥着生活的各种可能性。当时他就意识到，哈佛正是一个通向未来大量机会的开端。

海上旅程也透露出加尔布雷斯的第二个重要特点：这条崭新的迂回转折的航程，隐隐展露出他的职业生涯将会走上一条特别曲折并常常充满挑战的道路。他于1908年出生在安大略的一个农家，从他早期的学术经历看，几乎不可能获得哈佛的教职。与其他许多青年不同，他在家乡既没有接受学前培训，也没有去欧洲“镀金”，更没有去常春藤名校接受大学教育。与之相反，他成长在艾奥纳站，这是伊利湖以北的一个小村庄，仅有25名或者30名居民。他与其他十来个孩子一起，在威利学校受教育，这是当地一家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然后他在艾奥纳站旁的达顿镇上中学，毕业后考入名不见经传的安大略省农学院，五年后获得学士学位。

况且，虽说他现在即将进入美国最好大学的经济学系，可他甚至还没有主修过经济学。他的专业是畜牧学，他所擅长研究的是短角牛和赫尔福德肉牛，而不是什么成本曲线或最大化方程。的确，只有在向西经过近2500英里的旅程抵达加利福尼亚州后，他才接触到现代专业经济学的课题与方法。正如他后来回忆起

那几年的时光时所说的，直到在伯克利加州大学上研究生，他才知道了那些声名卓著的经济学家的大名，如“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或索尔斯坦·凡勃伦，还有从报纸之外，更多地了解了马克思”。

加尔布雷斯特抵达坎布里奇，也透露出他的第三个特质：哈佛大学的杰出教授，包括高级经济学家们，无论当时，还是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之后，都很少注意到他。在那种环境下，这很平常。加尔布雷斯特只不过是个任期一年的新讲师，况且他的特长是农业经济学，这个专业很难吸引这些都市的大学教师，还有那些衣饰得体、享有特权的学生的注意。

以上三点，部分是内因，部分是外因——后天学养同自觉形成的思想与风格的一致性、职业生涯的特定环境、与部分谨慎而保守的同僚保持距离，有助于解释加尔布雷斯特那鲜明的生活，还有他同样特立独行的经济学学说。当然在今天看来，他早期性格中所隐含的特质已完全实现了。无论他的仰慕者还是评论家，几乎没有人不同意他的人生受到过上述影响。作为哈佛大学保罗·沃伯格经济学客座教授，到1975年退休时，他已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和美国艺术文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院长，这是无人分享过的双重荣誉，也体现了他广阔的才智范围。他为三任美国总统担任过顾问，还是前驻印度大使、《财富》杂志编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面负责消费物价管制。他撰写的经济学著作，被翻译成36种语言，行销不少于700万册。他是20世纪最广为人知的美国经济学家之一。他以独特的声音和想象力，为经济学的论题添加了一连串长长的令人难忘的词汇——“丰裕社会”、“传统智慧”、“反补贴权力”、“技术结构”……

尽管取得了所有这些成就，在美国经济学和公共生活中，加尔布雷斯特依旧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他那坦率却雄辩的关于政治自由的学说，在今天（如在往昔的岁月一样）已淡出主流，变得不合时宜；他的经济学说，深深牵涉到他的那些政策，因而招致非难和批评，即便在经济学家的小圈子里，也时不时会出现嘲讽的声音。他们会对他的概念贴上标签，诸如这也许很有趣，但最终只不过对数学化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复杂思想作出边际贡献而已。例如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诺贝尔奖获得者）就冷冰冰地描述加尔布雷斯特“对非经济学家来说，才是美国的首要经济学家”。

然而，对于他的工作，还有他教会我们如何去思考经济学及其与政治和权力的关系的贡献来说，这种描述真的公平吗？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描述真的准

确吗？尽管在现代经济学中有“凯恩斯学派”或“马歇尔学派”，可以肯定的是，并没有什么“加尔布雷斯学派”，但加尔布雷斯一贯坚持的对主流显性假设及其研究方法的批评，比起萨缪尔森那些轻慢的话所暗示的，有着更大的影响力。

回顾一下1979年《美国经济评论》针对经济学家做的一个调查，这个调查的目的是衡量他们在专业领域内就关键理论点的共识。在30项提问中，只有一处提到了一位经济学家的名字，就是常持异见者加尔布雷斯。这个提问涉及他那著名的对“公司国”（corporate state）的猛烈抨击，他的《新工业国》（*The New Industrial State*）一书正体现了这种争论的核心。该调查问到他的批评是否“准确描绘了美国的经济背景和结构”，即使在放弃数学模型，公然违反正统经济学的基础概念“市场效益”的情况下，结果，有52%的人说他们同意加尔布雷斯。闻听此讯，加尔布雷斯的说法是，他很满意只有48%的人表示不同意。

但在1934年9月，当这位年轻的经济学家刚离开“阿卡迪亚号”，凝视着波士顿的静穆天际时，他既无法预料自己今后的事业或成就，也无法预料将要面对的复杂且矛盾的现代经济学变革。那时他可以确定的事情是，他将成为美国最负盛名的大学里最受尊敬的经济系中的一员，只等着手例行事务，开始新的人生，其他一切，暂放一边。

加尔布雷斯离开波士顿港口，坐地铁到达坎布里奇。越过查尔斯河，在午后燥热的天气下，他来到哈佛广场。按照安排，他的行李被直接送往他的住处，他已在两位姓布拉德福德的北方女士家订好房间，那里离哈佛校园只有几步远。

出了地铁站，他凝视着哈佛广场的红砖外墙，自1636年来，广场就是哈佛校园生活的中心。周遭是闹哄哄的麻省大道的车水马龙，行人拥挤在人行道上。你能一眼辨识出哈佛学生，这些自信的男青年，外套和领带都与众不同，即使毕业了，他们也依旧如此穿戴。他们背着包奔往住处，或拿着刚刚从哈佛书店购买的书籍，穿过广场。

当天晚些时候，在去经济系报道之后，加尔布雷斯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一个大而灰暗的房间”，他阴郁地回顾起往事，这里是韦德纳图书馆的顶楼，与经济系其他主要教职员工有一些距离，他将在这里开始他的哈佛生涯。

当晚，也许是希望留下一个正面的第一印象，年轻讲师面对他的女房东——两位布拉德福德小姐，把自己在刚刚逝去的夏季里对新政和美国农业调整署的想法，拿来与她们分享。不管他有意无意，罗斯福主义运动显然让两位老派的北方共和党人愤怒不快，并造成了心理阴影。第二天早上她们便请加尔布雷斯

离开，把他还吓了一跳。他很快又找到了在欧文顿附近的新住处，他的新房东是“一名有凶巴巴面孔的爱尔兰女子”，她“在我的学院岁月中容忍我”，他深情地回顾说，“波士顿爱尔兰人一直以来都对我有深厚的感情。”

如果说抵达坎布里奇的最初几小时，就带给年轻的加拿大人相当突然的变化，那么这些变化对比日后那些巨大的变化，就是小巫见大巫了。这种种变化起先是发生在他新加入的院系和大学，然后是在经济学专业中，最后也最重要的就是美国本身的变化。作为从缅因州到佐治亚州的纺织工人罢工的一部分，在洛厄尔、劳伦斯和新贝德福德附近，聚集起2万名好斗的工人，他们与手执警棍的州警发生冲突，在昏黑的纺织厂外搭起铁丝网和木头路障。在缅因州、罗得岛、康涅狄格州等地，州长已出动国民警卫队来对付超过15万名罢工者。波士顿的报纸报道说：在南方的“一次恐怖暴动”中，十几名罢工者被打死。暴乱在若干城市发生，白宫被围困中，需要动用军队平息暴乱。

此时，罗斯福总统上任仅18个月，对于新总统而言，这还只是最近的罢工，而绝非他想真正面对的最大规模的罢工。1933年3月，罗斯福刚从纽约州州长职位迁任总统，就被卷入美国资本主义史上最可怕的一次经济衰退中。估计有1300万美国人，即1/4的美国劳动力，失去了工作（虽然某些人估计实际数目接近2000万）；在过去4年中，国民收入下降了超过一半，外贸额下降2/3。在同一时期，汽车产量从年产新车270万辆下降至60万辆，而农产品价格已下降了40%。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平均股价大幅下挫，从平均每股90美元跌至平均每股17美元。正如一位记者尖刻形容的，如今罢工的情形是不是酷似佛兰德斯战场？^①

罗斯福的共和党前任、倒霉的胡佛总统曾试图应对这史无前例的经济崩溃，但他动手太晚而未能控制住这场大危机的发展态势。例如在1930年6月，为了安抚前来白宫寻求联邦行动的惊慌失措的商界领袖代表团，他轻率地宣布：“先生们，你们晚来了60天，萧条已经过去。”非常时刻的这次演说，正如日后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所述：“人们感到脚下的大地在让路。”胡佛总统那差劲的时机感真是“无与伦比”：萧条其实才刚刚开始。胡佛的幕僚们给他的竞选帮了倒忙，最初一直坚持说“没必要担心”，股票的“现价很便宜”。而他的财政部长、百万富翁安德鲁·梅隆领悟到只有一种办法来解决危机：“清算劳动、清算

^① 佛兰德斯战场：在1915年的10月8日，加拿大的医生John McCrae亲眼目睹了残忍的战争剥夺了那么多战士的生命，他写下诗歌《佛兰德斯战场》以纪念为保卫祖国而献身的战士，从此激励更多年轻人投入战争，保卫家园。——译者注

库存”，他声称，“清算农民，清算房地产”。结果自然是胡佛在干了一任后下台，留下了美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烂摊子。

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尤其是当他允诺说“我们唯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时，显然试图安抚同胞们那梦魇深处的恐惧。但就连罗斯福也对被他演说所引发的反应毫无准备。接下来的数日，五十多万封信淹没了白宫的收发室。绝大多数是宣布支持新总统，但其中还有数以千计的信的内容更简单直接：“总统先生，可否给我一份工作”；“罗斯福先生，请你救救我的农场”；“亲爱的总统，我不能养家糊口，请求帮助”。经过七年多共和党政策占统治地位的日子，一度繁荣的经济日渐崩溃瓦解，这个国家不仅在为民主党人入主白宫和国会做准备，也在为它戏剧性的变化做准备。但到底应该怎么办？为这种变化将要承担什么风险？

总统夫人埃莉诺日后回忆，就职演说日“非常、非常庄重，还有一点可怕”。其实可怕才是首要的，她在当晚的日记中这样写道：“罗斯福遭到最可怕的示威抗议，因为他在演讲中说道，对他而言，或许有必要在战时由总统一人独掌大权。”此前一个月，希特勒已经成为帝国新总理，墨索里尼也已成为独裁者，对于美国民主的未来，这可能意味着什么？“会有种盲目向前的感觉，”当晚她痛苦地写道，“因为我们身处激流中，没有人知道哪里能着陆。”

心怀恐惧的不单单是罗斯福夫人。在椭圆形办公室里，总统向幕僚们诉说过自己的一些情感，数年后，幕僚们仍发誓保守秘密。一个幕僚事后回忆：就职后的次日清晨，罗斯福说他被惊醒了。

他有一种想要着手工作的紧迫感，所以他一吃过早餐，就坐轮椅去他的新办公室。坐在总统的座位上，他突然发现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自己一人。书桌是空的，抽屉也是空的，总统甚至找不到铅笔和便笺来做笔记。他在案头寻找蜂鸣器，却没有发现任何按钮，通向外界的信号断了。他坐了一会儿，大房间的回声随之沉寂。在这危急关头，行为中枢却与全国切离了。最后他鼓足精神，尽力大喊了一声，（他的助手）米西·莱汉德和马文·麦金太尔终于从隔壁的房间赶来了。

幸运的是，在20世纪余下的岁月中，直至罗斯福总统逝去，只有很少几个受信任的人听过这个故事。若能理解为何在上任的第一天，总统自己便茫然失措，那就能更好地理解他妻子所强调的那些“可怕”日子了。

正当罗斯福面对自己不仅沉重而且危险的工作时，他那遍及全国的众多支持

者与名义上的盟友也正激烈辩论着：新政府该怎么办？有什么纲领？它的目标是什么？罗斯福究竟是不是位称职的总统呢？

“今天人们已然忘却，左翼自由主义在 1932 年选举时的风尚是罢免胡佛和罗斯福，因为两者同样不可救药，”加尔布雷斯生动地回忆道，“有领悟力的人支持（社会党候选人）诺曼·托马斯，而在理智上不妥协的人则支持共产主义者，或干脆不参与。”而这个国家的保守派和普通公民们对这个见解的反应，如所料想的那样是纯粹的惊慌。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怀着最深的恐惧，在心里把罗斯福抹得如他的挑战者一样黑。

加尔布雷斯仍密切关注着这些辩论，对于他而言（即使作为加拿大公民，他无权投票），无论是支持社会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或他们的保守派的对手，都似乎不可思议。“作为一名加拿大青年，我有另一种指导方针。有两党可供选择，但这更像是与生俱来的。每个家庭都知道自己所属的党派，正如知道所属的教派一样。”

加尔布雷斯的父亲早在安大略时就是一位有一定声望的自由党积极分子，从 9 岁开始，他就经常陪同父亲参与地方选举活动，受到政治熏陶。多年后，他仍深情回顾起父亲关于幽默的力量的一场政见发表会：在一次农场示威中，他父亲站在一大堆干马粪上发表演说，然后故做诚恳状，向听众道歉说，自己不得不站在保守党的基础（马粪堆）上讲话。

经过就职伊始短暂的混乱无序，总统很快就克服了这种瘫痪的昏沉感。数日间，他的幕僚疯狂工作以草拟出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大胆的行为和声明，“使国家再度运转”，为以后的活力及迅捷行动定下基调，后来的法律和法令也更深思熟虑，措施也更多样。而这正是历史上的“百日新政”，即罗斯福继任最初几个月的施政行动，并奠定了之后活跃政府的基准，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政府；也成为衡量总统的标准，无论是对罗纳德·里根，对约翰·肯尼迪，还是对林登·约翰逊。罗斯福自己所承认的，比一个首尾一贯的纲领更重要的，是国家所渴望的一致行动，在某种意义上说，华盛顿已在着手做好一件事，至少是不使之恶化。

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记录了美国新任领导人的惊人成绩：

罗斯福总统上任三个月后，国会和国家遭受到一连串不同于以往任何理念与纲领的炮火袭击……此间罗斯福 15 次向国会致信，推动颁布 15 部重要法律，发表了 10 次演说，每周两次举行记者招待会和内阁会议，与外国元

首会谈磋商，主办过一次国际会议；在国内外政策方面，他都做出了重大决定，绝不表示出怯懦或惊慌，甚至很少发脾气。很多人很早就跟随他工作，但他的主宰力仍然令他们大为惊讶。在总统办公室外，(白宫幕僚)诺曼·戴维斯当遇到（他的同事）雷蒙·弗迪克时，表达了那些在威尔逊政府工作过的人的疑虑，“雷蒙，现在坐在里面的那家伙，可不像我们过去的那位啊！这里一定有个奇迹。”

罗斯福的积极性激发了崇拜者们的灵感，又让他的中伤者们闷闷不乐，有时甚至是恐惧。共和党众议员与《赫斯特报》（该报在1932年摇旗呐喊着支持罗斯福的共和党对手）开始阴郁地谈论总统的“共产主义”政策；在富人中间，他被唾骂为“本阶级的叛徒”而恶名昭著。这些保守主义者的强烈恐惧还表现为，在1934年3月，有多家报刊（包括《纽约时报》的头版）报道：一些总统的幕僚在秘密制订一项紧急政变计划。基于与罗斯福总统“智囊团中的智囊成员”交谈的本意，报刊宣称，罗斯福总统自己并不知道，这个计划会由一个无名的“美国斯大林”取而代之。

与罗斯福的纲领相反，他们猛烈抨击激进政府已深深卷入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而不仅仅是总统职权下的激进左翼或保守派的批评。在美国当年的专业经济学家看来，罗斯福所指出的方向似乎是恐慌的起因。

当然在美国，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的争论，已是司空见惯。例如在18世纪60年代末，对《英国印花税法案》（该法案的目的是在重商传统下规范美洲殖民地的贸易）的仇视就引发了美国革命。初兴的共和国一再被卷入种种议题的争论中，诸如政府的土地政策、关税、货币和银行问题，当然其中最激烈的议题就是自由劳动还是奴役的争论。即使内战以残酷手段刚解决了黑奴问题，伴随着美国新兴城市的发展，新争论也接连产生，主要针对工会、铁路和公用事业管制、出入境、垄断、股市欺诈、工资及工作条件等多方面的问题。

但经济学作为学科来讲还是非常新颖的。哈佛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才颁发了美国首个经济学领域的博士学位。直到1900年，美国受过专业训练的经济学家博士不超过100名。大萧条前夕，在有1.2亿人的美国，经济学家大概不会超过2000~2500人。这批新的“科学化”经济学家中的主导分子遵循的是出现于19世纪的自然科学模型，不过仍在为自己能否保持“价值中立”、冷静、不偏不倚的分析而挣扎不休。于是，他们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长达800页的《经济学

原理》(1890年)中受益匪浅。这本书规定了经济学领域的基本思路和方法,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直到20世纪20年代,它还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们(包括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学习时的加尔布雷斯)的首选入门书籍。

对大多数接纳马歇尔观点的人来说,体现在新政中的思路是应该被诅咒的,因为这种思路意味着,政府会施加外部干扰,从而扰乱市场运作的效率。可以肯定的是,马歇尔自己也承认,市场有波动,所以有时会产生令人不安的衰退或通货膨胀,但市场能够进行自我调整以回归“均衡”。在均衡点上,资本、工人和自然资源都将得到充分且有效的利用。对马歇尔的追随者而言,这是不容侵犯的“科学经济学”的核心真理。

但这些经济学家的声誉,连同他们用基于演算和几何的数学所证明的“市场最了解一切”的观点,在大萧条开始时都受到重创。耶鲁的欧文·费雪也许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他曾经谨慎研究,然后满怀信心向投资者保证,“看来股价已经达到了一个持久的较高水平”。不幸的是,他是在1929年10月大崩溃的几个星期前说这话的。普林斯顿大学的约瑟夫·劳伦斯也在这样一个不恰当的时机发表了声明,几乎让自己名誉丧尽——他坚称“目前股价并未高估”,即使当时在一些行业中,股价已攀升到5倍于市场的长期平均值(正如20世纪90年代的网络股一样)。

大崩溃后一个月,不甘示弱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们通过哈佛经济学会发表声明,利用自己的“科学”对局势加以评议,这是美国首次为私人客户冒险做出学院预测。虽然1929年初已经稍显熊市,但在纽约交易所的残骸上,他们仍努力打消那些有钱人的顾虑:“1920年至1921年的严重衰退超出了概率的范围,我们并没有面临长期清算。”学会不断重申这一看法,直到它不久后被清算。

尽管有预测误差,罗斯福总统在1932年11月的选举还是令许多这样的人产生了新的恐慌。如果罗斯福推行在“百日新政”时所通过的众多立法,那就不只是一个预测的问题,而是治国安邦的根本政策,这会威胁到至今让马歇尔的经济学运转的理论,他们担心的是,美国经济结构本身的“自由市场”。

1933年末,在匆匆出版的名为《关于复苏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the Recover*)一书中,一群哈佛经济学人抨击了总统早期的新政政策。书中千篇一律地指责政府对市场的种种干预——从表面上看,这样做是为了“科学”的目的,而不是政治性的行为。这个观点(因为它只是来自哈佛)得到了新闻界的广泛关注,并一度扬言要在华盛顿引发一场真实的政治危机。尽管危机后来终于过

去了，但这本书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不仅反映了专业经济学家以及哈佛大学的心态，而且它所强调的是，今天的潮流完全左右了年轻的专业人士、数以百万计的经济学人以及美国人对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间关联性的看法。

凭借运气、时机和环境，在 20 世纪最紧要的关头，加尔布雷斯开始着手自己的工作，不仅是为了现代经济学研究，更是为了美国经济和政府本身。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激荡欧洲的君主和帝国那样，美国也正准备推翻占统治地位的许多旧有的模式和信念。对此变革，新的学院派经济学家不仅是开路先锋，经济学本身也在变革中。

有一个话题曾经风行一时，如今已经变得很平常了，就是关于 1934 年诞生的“新政”的终结。也就是说，最终（有些不准确）被打上了“凯恩斯主义”标签的罗斯福关于积极政府的想法以及相关的经济理论，所谓的激进主义分子、干涉主义者，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正是我们的“新时代”，换言之，信息时代已经取代了工业时代。电脑、光纤、生物技术是新美国经济力量的新能源，随之而来的，不仅是新的工作方式，还有新的生活方式。我们被告知，我们将会不断“随意”改变我们的工作（职业），管理医疗体系、投资、退休自主、全球化竞争，从而凭借我们的新自由赢得（如果成功的话）空前的繁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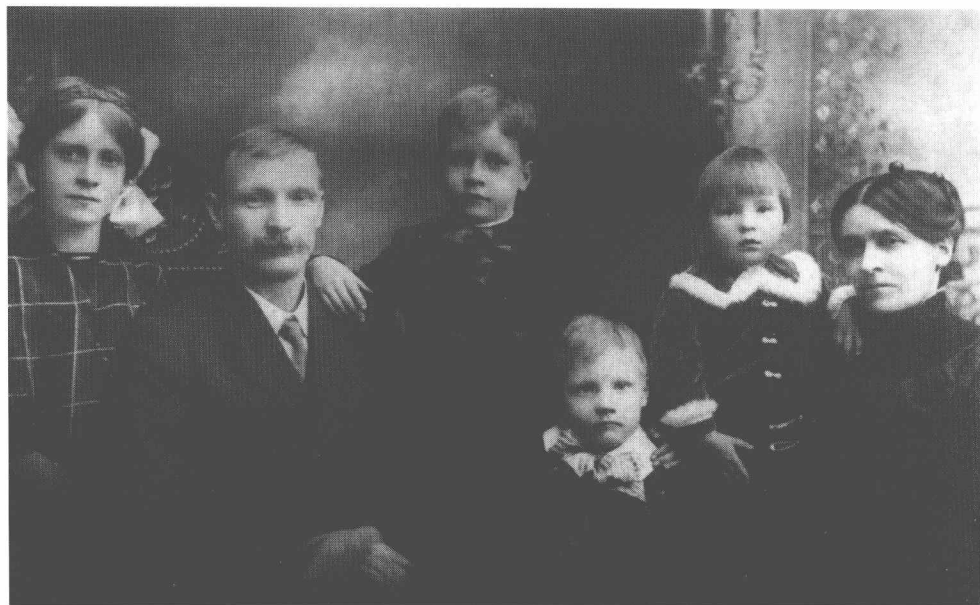
但这一切又有多新鲜呢？对于那个行将逝去的年代，当我们再审视旧时代的起源与兴起的原因时，能从中获得什么呢？美国人以能不断改造自己而著称，他们变更着假设，也变更着梦想。1934 年，当罗斯福之类的领导者同加尔布雷斯式的年轻人一道着手去改造他们所承袭的世界时，他们也是这样做的。

那么，他们面临了什么样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教派、习惯和偏见的差异，或者阶级、宗教、种族及成长背景的区别导致了他们那一代人所面临的困境？1934 年，美国熬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最近发生的一系列经济危机，包括油价上涨、滞胀、储贷危机、第三世界债务、亚洲、俄罗斯及墨西哥的经济衰退、社会保障制度的隐患、国家财富和收入差距拉大，等等，与 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危机相比，都黯然失色。不过，美国安然度过了那场危机，从灾难中重生并缓慢开始重建，这是物质世界与知识世界共同作用的结果。即便为了我们自己，我们也应该去考虑那一代人的所作所为，一切由何而来，并因何创造出了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

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对资本主义市场的最大政治挑战业已消失。五光十色的新技术给我们带来了崭新的生活方式，对此我们都会同意。20 世

纪初的那些科学技术革命——飞机、汽车、无线电、电影、电唱机，还有在化学、物理学、医学领域取得的惊人进步——与今天的互联网和个人电脑、移动电话、光纤、卫星以及我们今天忙着庆祝的遗传学的进步都一样重要。然而技术进步无法保证无限的和平与繁荣。与25年前相比，当今中东局势仍不稳定，大量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经济困境，谁能肯定地说清楚新世纪将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的一生，让我们有机会去了解一位天才奇妙的职业生涯。然而他所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这些，在本书中，我们不仅能够了解他有关现代经济（和政府）如何运作的观点，还能一窥已经变革并仍在变革中的诸多经济理论。这些经济理论是一个整体，但也彼此冲突碰撞，以寻找它们试图引导的经济方向，从而能更深入地了解我们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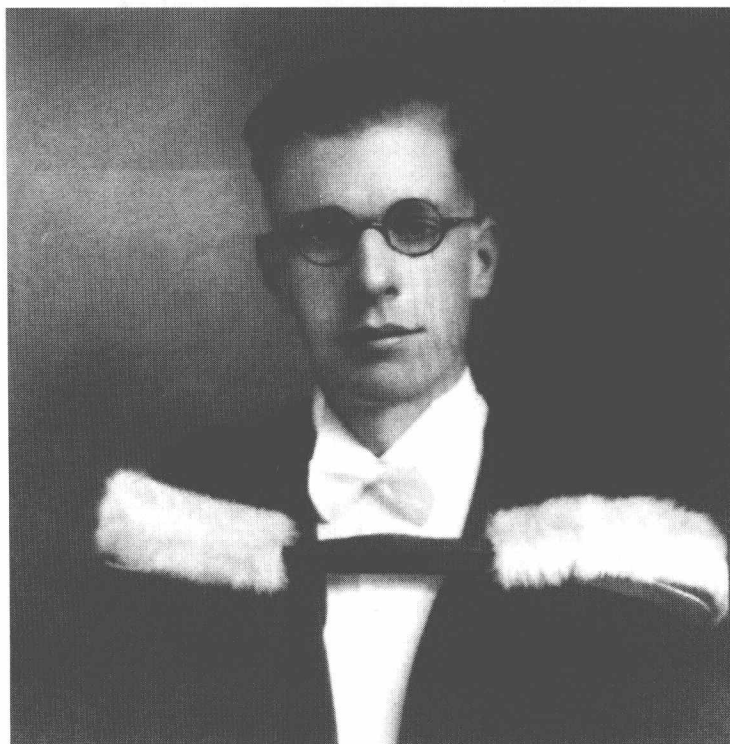
全家福 (1915年): 从左到右依次是爱丽丝、阿齐巴德·加尔布雷斯、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比尔、凯瑟琳和萨拉·凯瑟林·加尔布雷斯。



安大略农场男孩 (1918年): 站着的男孩是比尔, 坐在草地上的男孩是加尔布雷斯 (右) 及其表兄 (左)。



加尔布雷斯（前排右二）大学时代的辉煌时刻：参加国际牲畜展的名单。



1931年加尔布雷斯从安大略省农学院毕业的照片。